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DOI:10.16595/j.1671-055X.2026.0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译本的出版与影响

王 飞, 翟亚纤

(陕西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译本的出版与传播,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深度交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作为唯物史观的纲领性文献,传播历经思想破冰期的片段引介、革命初期依托日文本的转译与阐释、发展期全译本的突破及教条化风险,最终在成熟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融合。这一过程展现了唯物史观从“外来学说”逐步转化为中国革命“内生逻辑”的历史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微观缩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根基。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5X(2026)02-0013-16

近代中国深陷救亡图存与文明转型的双重困境,传统思潮与改良尝试均难破困局,马克思主义凭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成为指引中国革命的真理之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作为唯物史观的纲领性文献,其翻译出版与传播轨迹,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深度交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的重要微观载体。然而,学界对这一关键文献的专题研究还需要系统梳理与深化。

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已有不少探索,既有成果多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整体传播脉络,或从宏观层面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对《共产党宣言》等标志性文本的译介研究尤为深入。但相较于这些通论性或单一文本的专项研究,《序言》的学术关注度明显不足。相关讨论多散见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通论著作中,未能针对其独特价值展开系统考察,既未细致梳理《序言》中译本在不同革命阶段的形态演变,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以日语为中介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转译特征、发展期全译本的突破意义、成熟期核心术语的定型过程,也未充分厘清其理论认知的深化轨迹,如早期经济一元论认知偏

收稿日期:2025-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调查未刊资料整理与研究”(23BDJ072)。

作者简介:王飞,男,河南沈丘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翟亚纤,女,甘肃陇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差、发展期教条化风险的规避,以及与革命实践的具体关联,尤其忽略了《序言》在破解中国社会性质争议、支撑土地革命政策制定,以及延安整风运动实现思想和行动统一中的核心作用。从国内外研究动态来看:国内研究侧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的历史脉络梳理,注重宏观叙事的完整性;国外研究则多聚焦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学理阐释,对中国特定革命语境下经典文献的本土化传播关注有限。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虽为研究热点,但对单一核心文献在译介、阐释与应用过程中的具体细节挖掘仍存在空白,难以充分展现唯物史观从外来学说至革命指导的转化细节。

基于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序言》中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各阶段政治语境,系统梳理从思想破冰期的片段引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隐蔽传播、发展期的全译突破,再到成熟期的本土化融合的完整轨迹,重点分析不同阶段译介策略与政治环境的适配性、理论认知偏差的成因及对革命实践的影响,包括土地政策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建、延安整风运动的支撑作用,旨在还原《序言》中译本的传播全貌,揭示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实践深度融合的历史必然。创新之处在于以《序言》这一文本为切入点,丰富单一经典文献微观传播史的研究,预期成果既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理论落地细节的认知,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传播提供历史镜鉴,也为经典文献与革命实践的互动研究提供典型案例。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土壤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扎根生长,既在于其自身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特质,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也依赖于先进知识分子主动筛选、创造性转化的理论自觉,更得益于出版界与思想界的同频共振。

(一)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突破

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深陷认知困境。传统儒学思想在列强入侵的现实面前崩塌、洋务派器物革新的失败证明仅学技术不足以救国、维新派君主立宪的尝试随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虽推翻帝制却未能终结动荡。此时的中国亟须一种能够把握社会本质、直指社会变革的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首先要看它是否真正地揭示了研究对象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1]。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2]这一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核心内涵,正是《序言》中系统阐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散见于不同时期的各类著作中,这种分散性给知识界系统获取、理解唯物史观带来了较大困难。相比之下,马克思在《序言》中仅以不足3000字的篇幅,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化、科学化的概括,降低了理论认知的门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920年陈望道已翻译出版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但其核心功能在于政治动员,而非对唯物史观的系统阐释;1927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其他著作如《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在当时都没有译介。

《序言》由此成了国人公认了解和研究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文本依据。

这种理论突破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实践性。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通过系统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思想家的局限,科学阐释了社会变革的本质。马克思主义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剖析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将社会主义从道德批判升华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由此科学论证了社会化生产与私有制的根本冲突必然导致制度变革,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不仅解释世界,而且通过把握现实矛盾的运动规律,为改造世界提供科学依据与方向指引。正是这种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使其在与诸多社会思潮的竞争中,最终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

(二) 先进知识分子的理论求索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被动接受,而是知识分子主动筛选、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五四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精英辈出。以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既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熏陶,又深怀救亡图存的使命。他们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渐演绎成惊天动地的共产主义运动^{[3][34]}。

彼时思想界正值“百家竞起,异说争鸣”,封建顽固势力与新文化运动争夺阵地,各种思潮激烈碰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展开三次大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聚焦中国革命是否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探讨改造社会应走革命还是改良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则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态等根本问题。三次论战的交锋,加之新村运动、工读互助等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推动更多知识分子诀别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投向马克思主义怀抱。恰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147]} 当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时,终于解开了关于救国道路的长期困惑。他们认识到:唯有唯物史观才能穿透表象,触及社会变革的深层逻辑。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分析中国经济基础,试图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中寻找破解困局的密钥。

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主动求索与实践检验相结合的结果。这种理论求索彰显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自觉,在深刻反思后,选择了能真正指引中国出路的科学理论。

(三) 近代新闻出版业的物质技术基础

思想的传播离不开物质载体,近代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技术条件。1919年到1920年,全国涌现出宣传新思潮的报刊达400多种^{[3][34]}。这些大众传媒凭借时效性强、发行量大、传播迅速、读者面广且易于保存的优势,成为宣传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阵地。近代上海的棋盘街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出版发行中心,群益书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均坐落于此,形成了一个充满竞争与合作的独特商业出版场域^[5]。正如罗伯特·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所言:“(启蒙运动)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6] 这一论断在中国语境中

具象化为:出版界把握思想市场的脉动,以敏锐的商业嗅觉回应时代需求,通过规模化出版将思想家的理论探索转化为可传播的文化产品,使新思潮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正是在这一物质技术基础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得以展开传播实践。“要搞社会革命,便不得不依靠宣传。”^[7]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刻洞悉传媒的价值,将其视为连接理论与大众的纽带。他们既是潜心钻研理论的思想探索者,亦是善于运用传媒的传播实践者。他们明确认识到,争夺言论与出版阵地,与唤醒民众、构建自身话语力量密不可分。由此,他们采取了多元的传播方式。这一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接连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其中不少是马恩著作的译文,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8]47}。

出版业的物质条件与思想界的传播实践相互成就,使唯物史观不再是藏于书斋的学术概念,而成为分析中国社会、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在思想启蒙与政治高压下的片段传播(1919—1927年)

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撕开了思想裂缝。这一时期,《序言》以日本学者的研究为中介进入中国知识界。然而,军阀割据的动荡政局与北洋政府的思想禁锢,决定了其传播只能以片段摘译、边译边释的隐蔽方式进行。从李大钊、陈溥贤的早期引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背景下的有限传播,《序言》的译介既承载着救亡图存的时代焦虑,也面临着转译语境下的理论偏差。

(一)政治语境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军阀混战,“救亡图存”与“社会改造”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新思潮被李大钊、陈溥贤等留日知识分子关注,《序言》中唯物史观的核心段落正是在此契机下通过摘译进入中国。然而北洋政府及保守势力对新思想的压制始终严苛,先后颁布《出版法》《报纸条例》等法令,剥夺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在社会失序与思想启蒙并存、政治高压与探索热情交织的特殊环境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能通过进步青年举行秘密读书会和研究会等方式进行,《序言》等经典著作的早期译介,则依托《新青年》《晨报》副刊等进步阵地,以学术研究、学说介绍的名义摘译片段,巧妙规避审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成为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转折点。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提出翻译“马克思全书”15种的计划,其中便包含《政治经济学批判》(含《序言》)。但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物质条件的种种限制,这个出版计划实际只出版了《工钱、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三部著作^[9]。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革命形势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抓住契机扩大理论宣传,成立上海书店,专门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还利用《向导》周刊、《新青年》等平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领导工

人运动。在合作下亦有冲突,国民党右翼势力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分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活动也因此受到限制。

这一时期压制与开放并存、自发与组织交织,这样的矛盾使《序言》的早期传播因思想启蒙与国共合作获得有限发展空间,但由于反动势力压制与合作裂痕难以实现系统传播。

(二)译介特征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多有留日经历,以河上肇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已形成系统研究,日文本成为最易获取的翻译底本,对《序言》的译介主要依托日本学者的著作进行转译。

1919年2月,《晨报》副刊改版,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增设“马克思研究”专栏。在5月5日纪念马克思诞辰时,专栏登载了日本河上肇著、渊泉(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文中摘译了《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并对“社会生产”“社会意识形态”等难懂词句作了注释^{[10]248}。这种“边译边释”的方式是当时译者们普遍采用的方法,即逐字逐句翻译之后,加以注解,通过译者的注解帮助读者理解晦涩的理论。同年5月15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连续刊登于《新青年》,系统节译《序言》中唯物史观的核心论述,还特别标注“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11]4},在译文后,还将唯物史观概括为“经济决定论”与“社会组织进化论”。

1921年,范寿康在《东方杂志》发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将《序言》划分为五段译介,每段后附解说,还声明“虽间有少许的私见,可说完全是根据河上博士的意见”^[12],进一步延续了日语转译和边译边释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李达翻译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时,首次尝试突破单一翻译路径。他以日文译本为基础,对照德文原版补充内容,在附录“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中译出《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论述,并加译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经过的说明。这一译文相较于李大钊等人的译文更加完整,体现了对不同文本来源的整合^{[10]19}。

(三)内容理解

这一时期对《序言》的理解受到转译语境与理论储备不足的影响,存在明显局限,集中表现为“术语偏差”与“理论割裂”两大问题。

术语翻译的偏差直接扭曲了核心概念的内涵。如《序言》原典中“生产方式”是统摄“物质生产的技术形式”与“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范畴,既包括“如何生产”的技术层面,也涵盖“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社会关系层面,河上肇在著作中将其简化为“生产方法”,将这一辩证统一体拆解为单纯的技术操作层面,把生产窄化为如何生产的工艺问题,仅强调技术维度。中国译者受其影响沿用了这一译法,如李大钊、陈溥贤等均将其译为“生产方法”。类似的偏差还体现在将“上层建筑”译为“上部构造”“上层结构”,将“社会形态”译为“社会秩序”。这些术语的日本化痕迹,反映出早期对理论系统性的认知不足。

理论接受的割裂性则更具深层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3]阶级斗争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其最高形式是战争,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

创造者,是人民战争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缺乏人民战争这一关键力量,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社会就无法向前发展。河上肇在阐释唯物史观时,过度强调“生产力的自动演进”,将其解读为“经济一元论”,忽视了辩证法与阶级斗争的作用。这种倾向通过译介传入中国,使知识界在最初理解唯物史观时蒙上了“机械论”“定命论”的色彩。在这种解读下,阶级斗争作为人的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动性被弱化,这就与阶级斗争学说形成了表面对立。恽代英认为,“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一个是被马克思应用的方法;一个是被马克思发现的事实,二者有根本区别。”^[14]这种将二者割裂的认知,正是早期传播中片面理解的典型表现。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详细阐述了这种表面矛盾:“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11]^[18]这种认知偏差,使早期部分革命者忽视了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逻辑,即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直接动力,两者是内在统一的。这种割裂最终为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埋下隐患,使革命遭到失败。

(四) 革命影响

尽管存在认知局限,《序言》的片段传播仍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交锋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实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思想论战中,《序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其他思潮的理论武器。1919年,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胡适主张以渐进改良解决具体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以《再论问题与主义》回应,以唯物史观阐明思想变革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提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15]强调主义是改造社会的理论工具,并提出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这场论战使《序言》中的唯物史观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1920年至1922年,在“社会主义”论战中,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公开发文,主张精神改造决定物质改造,社会主义不必从物质上破坏现存社会制度入手,只需从思想上改造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即可,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是违反国民性。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予以驳斥,指出社会革命在于客观的经济变动,而不在于主观的愿望;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决定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是不可避免的;中国革命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其核心论据正是《序言》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原理。这场论战中,《序言》的片段论述虽未能形成完整理论体系,却帮助马克思主义者守住了“革命必要性”的话语权。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序言》的传播直接服务于革命纲领的制定。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

海召开,首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其理论基础正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初步认知,这种认知的形成,离不开《序言》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思想。

此外,《序言》的传播还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实践探索。1922年,彭湃在广东海丰开展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提出一系列关于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的思想主张,为土地革命的开展积累了经验。同时,毛泽东自1925年起就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领导农民运动之中,高度重视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系统研究。毛泽东在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文中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构建起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精准把握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科学制定面向农民的政策,筑牢了关键根基^{[8]157}。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6]这一论断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实践应用,通过组织和发动农民运动,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推动社会整体变革。

三、在白色恐怖与根据地建设中的全译突破(1927—1937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格局进入白色恐怖与红色割据的尖锐对抗阶段,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使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转入地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土地革命,迫切需要系统的理论指导,这种压制与需求的矛盾催生了《序言》全译本的出版。1930年后,刘曼、郭沫若译本的相继问世,不仅实现了术语的逐步定型,而且使唯物史观从思想启蒙文本转化为分析社会性质、指导革命道路的实践工具,同时也暴露出教条化应用的风险。

(一)政治语境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推行“清党”政策,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8]232}。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也陷入艰难境地。面对严峻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并未退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继成立,团结了大批进步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宣传阵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保留火种。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相继颁布《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等法令,以“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等罪名对革命进步的书籍、报刊进行查禁,并以暴力手段迫害文化界、出版界进步人士,实施“文化围剿”。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化工作者始终坚持斗争,探索特殊的传播路径。1931年底,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该书一经出版便遭查禁,书商被迫以“政治经济学会名义”改书名为《经济学批判》再版,再次被禁后,书商将原封面撕去,换掉封面,改名为“李季译”,以此来躲避审查^[17]。这种伪装传播成为国统区马克思

主义著作流通的常态。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1927年,八七会议确立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总方针,井冈山、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相继建立,急需理论指导土地革命与政权建设。这种国统区压制与根据地需求的反差,直接催生了对《序言》全译本的迫切需求。

(二)译介特征

大革命失败后,仅靠片段译介已无法满足革命实践的需求。译者们开始致力于呈现《序言》的完整逻辑框架,翻译方式也从早期“边译边释”转向不加个人注释的“纯粹翻译”,《序言》全译本的出版正是这一转变的标志。

1930年5月,刘曼借助英译本、日译本和德文本(多借助友人之力)^{[18]3}所译的《经济学批判》单行本在上海乐群出版社出版,印数2000册^[19]。该译本首次完整收录《序言》全文及正文前两章,是这一文本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刘曼在“译者序”中提到:“出版了足足七十年的这本经济学批判,谁也知道是马克思先生的全部遗教中一本最重要的经济文献,是全世界劳苦群众的圣经,早已有了各种文字底译本。然而在中国,直到现在,直到马克思主义所煽起的革命焰火渐次迫近我们四周底现在,直到我国劳苦群众正在觉醒地接受时代要求底现在,直到我国思想界起了进一步的转变底现在,直到旧社会将随历史的车轮转入万劫不复的深坑中底现在,这样一个可贵的宝物,才有我这一本卑之无甚高论底译本,毫无疑问是我国思想界一件不可恕的缺恨。”^{[18]1}刘曼希望能通过完整译本填补思想界的“缺恨”,为不谙外文的读者提供接触原著的机会。同时,也坦言翻译的难度:“再说理解本书底不容易,除去英译者已先为我指出的诸点以外,最使我感到困难的是经济学批判绪言这一篇。”^{[18]3}虽然刘曼译本存在将“生产方式译为生产样式”“上层建筑译为上层结构”等的术语偏差,但填补了《序言》无全译本的空白。

1931年1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推出了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该译本的出版实现了译介质量的重大突破。作为国内第一部从德文原本译出的中译本,该版本以考茨基整理的1922年德文版为底本,同时参考英、日译本,文本来源的权威性显著增强^[20]。郭沫若的译本首次将“上层建筑”精准译出,虽将“生产方式”译为“生产方法”,但意义已趋近原著内涵。这一译本因译文精准,1932年、1939年、1947年曾重排出版,由此可见该译本受欢迎程度之深,影响范围之大。

除刘曼和郭沫若的两个全译本外,摘译活动也从未停止。1928年5月,《流沙》特刊号发表了《唯物史观原文》,主要编者李一氓,其中辑录了《序言》有关唯物主义的论述^{[10]272}。此后出版的《辩证法经典》和《社会主义底基础》等著作,《序言》都被摘译其中。

(三)内容理解

这一时期,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实践问题的迫切要求,知识界开始对唯物史观展开进一步研究,不再局限于《序言》中那段“唯物史观公式”的表达,而是延伸至《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蕴含着辩证法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经典著作,由此在中国

思想界掀起了研究唯物辩证法的热潮,唯物辩证法也被视作解读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这一研究热潮,得益于留苏知识分子回国后对苏联文本的广泛传播,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从借助日译本逐步过渡到以苏联文本为核心。这种将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相统一的认知受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21]等苏联著作的影响。然而,以苏联文本为核心解读马克思主义,也潜藏着教条化风险,以王明为代表的部分革命者,在政治上忽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提出“一次革命论”,推行“城市中心论”,否认农民革命性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性;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后又转变为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这些错误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给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挫折。与教条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率先突破思想桎梏。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2]109}“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2]110},这一主张本质上是对《序言》中唯物史观原理的灵活运用,通过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思路,不仅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埋下伏笔,也为正确理解《序言》的实践品格提供了方向。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成为思想界争议的核心议题,即中国究竟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之相伴的是人们对中国革命性质及未来走向的迷茫。非马克思主义者(如以陶希圣为首的“新生命派”)提出“中国封建制度崩坏论”,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否定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观点予以批驳,在《新思潮》杂志登载了“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向省吾)”“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王昂)”“中国土地问题(吴犁平)”“中国劳动问题(李一氓)”等文章,从多个维度剖析中国经济的特质,指出封建及半封建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论证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读书杂志》等刊物也相继发文,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道路的基本认知。这场论战不仅厘清了学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模糊认知,也成为检验对《序言》理解深度的关键场域。

随着社会性质之争的深入,论战焦点也从现实层面转向历史领域,引发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讨论。陶希圣等人不仅否认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还质疑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针对这一质疑,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依据《序言》关于“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3]3}的论述,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在准确把握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前提下,系统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规律,首次以唯物史观重构中国历史叙事。郭沫若提出:“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入了封建时代。”^[24]这一观点开创性地证明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符合人类社会普遍规律,推动学界从生产方式角度分析社会性质,催生了“以唯物史观重写中国史”的学术潮流。

1934年至1937年间,论战的核心进一步转向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农村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与生产技术问题,而不是土地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予以反驳,从方法论层面驳斥“技术决定生产关系”等错误论点,指出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只强调生产力而忽视生产关系变革的看法存在偏差,明确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由此,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从城市和工业领域逐渐延伸到乡村与农业层面,人们开始从农村社会的角度深入地探究中国社会的本质。

通过系列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从多个角度论证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同时明确马列主义完全适用于中国。但受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人们的认识水平,加之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部分理论问题的讨论未能进一步深入,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

(四)革命影响

1927年至1937年,唯物史观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土地革命、意识形态斗争及学术体系构建中,更深刻作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人民军队的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复杂革命环境中把握历史主动的思想根基。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序言》中的唯物史观为土地政策制定提供了核心原理,群众观点则成为政策实践的价值导向。从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到1931年的土地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与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8]286}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是中国长期以来穷困落后的根源,只有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根本需求,让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获得土地,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进而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

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序言》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击国民党“民生史观”的武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为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构建“民生史观”以对抗唯物史观。他们刻意割裂两者的联系,甚至剥离民生史观中原本含有的唯物因素,将其建立在中国传统“仁爱”哲学之上,使其与唯物史观形成根本对立^[25]。对此,中国共产党展开了积极回击与坚决批判,两种史观的对立也成为近代社会学者争论的焦点。1937年,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系统阐释社会结构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构建了完整的唯物史观分析体系,毛泽东曾评价该书“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26],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学术化、体系化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1939年,艾思奇与吴犁平合著的《唯物史观》进一步推动理论本土化,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社会的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系统论述唯物史观基本观点,使理论内核与中国实际问题形成更紧密联结。这些著作通过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既瓦解了民生史观对唯物史观的歪曲,也巩固了唯物史观在学术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使《序言》的传播与捍卫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紧密结合,强化了作为革命理论的正统性地位。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唯物史观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原理成为中国共产党策略调整的核心依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成

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27],允许民族资产阶级等进步力量加入统一战线,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逻辑。1937年,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在国共两党澈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8],其理论根基包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核心观点,即只有团结最广大群众,才能赢得民族解放胜利。这一科学策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坚实支撑。

人民军队自成立起就将“一切为了人民”写在鲜红的军旗上。1927年,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为了人民而战斗”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起义将士用鲜血生动诠释了这一豪迈誓言。1927年,三湾改编通过“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官兵平等”打破等级壁垒^{[29]220}。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建党和建军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2]386},明确了人民军队“听谁指挥、为谁扛枪”的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与人民武装建设过程中,不断明确对军队的纪律要求,最初提出三项纪律,之后补充为六项注意,进而合并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最终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具体内容包括:“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说话和气”“借东西要还”^{[29]235}等。这些纪律以具体条款体现对群众利益的维护,让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形成了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

四、在延安整风与全国解放中的本土化融合(1937—1949年)

1937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延安,这片土地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高地。《序言》的传播也随之进入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阶段。延安相对稳定的革命环境为《序言》的本土化应用提供了土壤。从核心术语定型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构建,《序言》的影响已超越单纯的文本传播,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逻辑之一,最终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政治语境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正式展开,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但是国民党依然奉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并严格检查邮路,而“抗日”这一时代主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契机。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以及出版力量的逐步完善,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1939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指示,“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刊物书籍”^{[10]299},从政策层面为出版工作定向领航。同时,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解放社、军委编译处、马列学院编译部等机构的成立,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出版的核心阵地;新华书店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陕甘宁边区的出版发行网络。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在战争环境中带头学习、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力支持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此外,有利的革命形势与活跃的文化氛围为马克

思主义著作出版创造了外部条件。20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陕北局势相对稳定,中国共产党积极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实施宽松的出版政策,广纳文艺界、理论界等领域人才,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骨干队伍,营造了良好的传播环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再度激化。国民党表面开展和平谈判,实则积极抢占地盘,筹备发动内战,政治局势转向“两个前途与两种命运的决战”。在此背景下,《序言》的理论价值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政权在农村的统治根基,使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获得土地的农民为守护自身革命成果,主动参与组建人民武装、建立地方政权,还踊跃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过程充分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推动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从人力、物力等方面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译介特征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实践,核心特征体现为“重实践、轻新译”。1939年3月,延安解放社以“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形式出版了由王学文校订、何锡麟和王石巍(王实味)合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该译著参考的文本主要来自苏联,有俄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等版本,通过多源文本的参考与校对,首次精准译出“生产方式”这一关键概念,“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等唯物史观核心术语的译法也得到最终定型。

与此同时,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转向“让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大众化路径。哲学大众化的核心,是要走出“书斋里的学问”和“纯粹思辨的理论”,从“理性世界”回归“现实世界”,直面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聚焦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将哲学的基本理论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与民众息息相关的社会领域切实发挥指导作用。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正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标志性成果,将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进行通俗化转化,使原本抽象的理论概念变得易于大众理解和感知,有效推动唯物史观真正走向大众。

(三)内容理解

毛泽东作为唯物史观的坚定践行者与集大成者,始终紧扣中国革命实际,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1937年,《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突破以往认识的局限,实现了向方法论自觉的转变。其中,《实践论》通过系统论述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精辟概括出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矛盾论》首次将矛盾特殊性作为辩证法核心内容进行系统阐述,全面剖析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并将其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30]534},这一论断彻底打破将唯物史观视为教条的错误认知,明确将其作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科学方法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立场上的根本转变。1940年,毛泽东引用《序言》中“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

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3]这一核心观点讨论中国文化问题,明确强调一切理论与文化主张必须植根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同时,精准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以生产方式演变规律为依据,科学论证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为“革命分两步走”战略提供科学理论支撑。1948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4]¹³¹⁷。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任务与主要途径,“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31]这一正确判断基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民族资本主义虽能在一定时期促进生产力发展,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终将日益凸显,因此需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等形式逐步改造生产关系,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基础。这一构想以逐步过渡的科学策略避免了激进变革的风险,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

(四)革命影响

这一时期,《序言》的唯物史观经延安整风进一步深化,与实践深度结合,贯穿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全过程,形成从思想到行动的完整实践链条。

1942年,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报告,以整顿全党的学风、党风与文风。鉴于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需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借其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及策略问题。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32]⁸¹²,其中批判主观主义是核心,这种不良学风将理论与中国实际割裂,违背了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核心原则。因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32]⁸¹⁴。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列举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号召全党将其彻底抛弃。在整风运动后,全党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促进了全党的空前团结。

在抗日战争时期,《序言》中的唯物史观原理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思想纽带。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30]⁴⁴⁹,并结合中日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及国际形势,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为持久战战略提供理论支撑。解放战争时期,《序言》直接指导土地改革与战略决策。194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33],其依据正是《序言》中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判断。解放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立足人类社会进步图景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实践经验,阐释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要义。相关论述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相互呼应,成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大理论支柱,也

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提供了理论与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序言》已深度融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从理论启蒙到政策制定,从思想统一到实践突破,承载的唯物史观不仅是“外来学说”,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内生逻辑。刘少奇在《论党》中提出“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34]这一总结精准揭示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核心价值。

五、结语

通过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序言》中译本的完整传播历程,明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本土化传播路径与核心规律。《序言》作为唯物史观的纲领性文献,其传播始终围绕“回应革命实践需求”展开,革命初期为突破北洋政府思想禁锢,译者采用片段摘译、依托日译本转译的方式,以学术介绍为名规避审查,使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得以初步传播;在发展期面对国民党“文化围剿”与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双重现实,全译本的出现既填补了理论传播的空白,又为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制定土地政策提供文本依据;成熟期在延安相对稳定的革命环境中,核心术语的定型与理论的通俗化阐释,使唯物史观从知识分子的研究对象,转变为广大干部群众可理解、可运用的思想工具。这一过程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生命力,在于能够随革命实践的推进不断调整传播形态,最终实现与中国实际的深度融合。

在研究定位上,本文与既有成果形成明显差异。现有关于《序言》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传播的整体脉络梳理,或聚焦于某一时期、某一译本的个案考察,对《序言》中译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完整传播历程缺乏系统性的贯通研究。通过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政治语境中《序言》中译本的文本特征、理论认知的演变,以及《序言》在社会性质论战、延安整风等关键事件中的作用,完整呈现这一文献从“文本传入”到“理论应用”再到“实践转化”的全过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研究提供微观层面的具体案例,补充单一经典文献传播细节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一,在史料挖掘上,对部分译本的传播数据掌握有限,如刘曼译本在革命根据地的流通情况、普通读者的阅读反馈等,缺乏直接的档案史料支撑,难以精准评估实际影响范围;其二,在研究视角上,对《序言》传播与同期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联分析不足,未能充分探讨苏联、日本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译者的间接影响;其三,在文本对比上,对不同译本间的术语差异、阐释倾向的比较不够深入,尚未形成系统的译本演变谱系。

从价值层面来看,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细节,更在于为当代理论传播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揭示的“实践需求导向”“语境适配性”等传播规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史的研究维度;在实践层面,对《序言》术语本土化、理论通俗化的经验总结,可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阐释与大众化传播提供参考。

未来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可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拓展译者群体研究,结合档案史料厘清各译者的翻译动机与学术背景,丰富传播史的人物维度;二是加强区域对比研究,梳理国统区地下传播与根据地公开传播的路径差异、受众特征,完善传播史的空间维度;三是开展文本互动研究,考察《序言》与《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文本在传播中的相互影响,构建唯物史观早期传播的文本网络;四是利用数字化手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序言》的各类译本、相关论文进行系统整理与数据库建设,为后续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史料支撑。

参考文献:

- [1] 魏传光.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精神的精华”[J]. 红旗文稿, 2019(3): 4-7.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02.
- [3] 田子渝, 蔡丽, 徐方平, 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2.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5] 马建强, 贾秀羿.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首部恩格斯著作中译单行本的出版与意义[J]. 河北学刊, 2024, 44(2): 42-51.
- [6] 王郡. 一部大书与时代的传奇: 《启蒙运动的生意》述评[J]. 史林, 2007(2): 182-188.
- [7] 李斌. “星火此间著”: 上海老渔阳里2号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0(10): 91-100.
-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1卷(1921-1949)上册[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 [9] 王学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百年历程[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 6(7): 35-42.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11]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12] 范寿康.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J]. 东方杂志, 1921, 18(1): 60.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27.
- [14] 金梦. 中国知识界对唯物史观的阐释研究(1927-1937)[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40.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36.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3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84.
- [17] 王训昭. 郭沫若研究资料[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1120.
- [18] 马克思. 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M]. 刘曼, 译. 上海: 乐群书店, 1930.
- [19] 孙建茵. 刘曼是谁: 《经济学批判》译者考[N]. 光明日报, 2021-10-18(15).
- [20] 郭平英. 郭沫若研读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若干史料的重温[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2(11): 25-35.
- [21] 金梦. “革命逻辑”的彰显: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阐释转变(1927-1937)[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0(4): 77-83.
- [2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4]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4.
- [25] 王贵仁. 从传播“唯物史观”到建构“民生史观”:解析1920年代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态度的转变轨迹[J]. 社科纵横,2009,24(11):92-95.
- [26] 赖相桓. 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J]. 现代哲学,1990(3):14-16.
- [27]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04.
- [28]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30.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3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66.
- [3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17.
-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98.

The Public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ng Fei, Zhai Yaqian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ere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the course of China'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s a programmatic docu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dissemination of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ent through successive phases: fragmentary introductions during the ideological ice-breaking period,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based on Japanese versions in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stage, breakthroughs in complete translations alongside the risk of dogmat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period, and finally the localized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developed stage. This process not only demonstrate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volving gradually from a foreign doctrine to the endogenous logic of China's revolution, but also served as a microcosm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t provided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vict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责任编辑:张俊英 江伟]